

刘东主编 彭刚副主编
The German Conception of History

人文与社会译丛

德国的历史观

Georg G. Iggers

[美国]格奥尔格·G.伊格尔斯 著 彭刚 顾杭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HUMANITIES AND SOCIETY SERIES

德国的历史观

[美国]格奥尔格·G.伊格尔斯 著 彭刚 顾杭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德国的历史观 / (美) 伊格尔斯 (Iggers, G. G.) 著; 彭刚, 顾杭译. —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6. 2

(人文与社会译丛/刘东主编)

书名原文: The German Conception of History

ISBN 7-5447-0009-7

I. 德... II. ①伊... ②彭... ③顾... III. 德国-现代史-研究 IV. K516.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50299 号

Copyright © 1997 by Bohlau Verlag Ges. m. b. H & Co. KG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hanghai Copyright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6 by Yili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登记号 图字:10-2000-099 号

书 名 德国的历史观
作 者 [美国]格奥尔格·G. 伊格尔斯
译 者 彭刚 顾杭
责任编辑 李瑞华
原文出版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83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南京湖南路 47 号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丹阳教育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5.375
插 页 2
字 数 332 千
版 次 2006 年 2 月第 1 版 200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447-0009-7/I·2
定 价 29.5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主编的话

刘 东

总算不负几年来的苦心——该为这套书写篇短序了。

此项翻译工程的缘起，先要追溯到自己内心的某些变化。虽说越来越惯于乡间的生活，每天只打一两通电话，但这种离群索居并不意味着我已修炼到了出家遁世的地步。毋宁说，坚守沉默少语的状态，倒是为了咬定问题不放，而且在当下的世道中，若还有哪路学说能引我出神，就不能只是玄妙得叫人着魔，还要有助于思入所属的社群。如此嘈嘈切切鼓荡难平的心气，或不免受了世事的恶刺激，不过也恰是这道底线，帮我部分摆脱了中西“精神分裂症”——至少我可以倚仗着中国文化的本根，去参验外缘的社会学说了，既然儒学作为一种本真的心向，正是要从对现世生活的终极肯定出发，把人间问题当成全部灵感的源头。

不宁惟是，这种从人文思入社会的诉求，还同国际学界的发展不期相合。擅长把捉非确定性问题的哲学，看来有点走出自我围闭的低潮，而这又跟它把焦点对准了社会不无关系。现行通则的加速崩解和相互证伪，使得就算今后仍有普适的基准可言，也要有待于更加透辟的思力，正是在文明的此一根基处，批判的事业又有了用武之地。由此就决定了，尽管同在关注世俗的事务与规则，但跟既定框架内的策论不同，真正体现出人文关怀的社会学说，决不会是医头医脚式的小修小补，而必须以激迸亢奋的姿态，去怀疑、颠覆和重估全部的价值预设。有意思的

是,也许再没有哪个时代,会有这么多书生想要焕发制度智慧,这既凸显了文明的深层危机,又表达了超越的不竭潜力。

于是自然就想到翻译——把这些制度智慧引进汉语世界来。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此类翻译向称严肃的学业,无论编者、译者还是读者,都会因其理论色彩和语言风格而备尝艰涩,但该工程却绝非寻常意义上的“纯学术”。此中辩谈的话题和学理,将会贴近我们的伦常日用,渗入我们的表象世界,改铸我们的公民文化,根本不容任何学院人垄断。同样,尽管这些选题大多分量厚重,且多为国外学府指定的必读书,也不必将其标榜为“新经典”。此类方生方成的思想实验,仍要应付尖刻的批判围攻,保持着知识创化时的紧张度,尚没有资格被当成享受保护的“老残遗产”。所以说白了:除非来此对话者早已功力尽失,这里就只有激活思想的马刺。

主持此类工程之烦难,足以让任何聪明人望而却步,大约也惟有愚钝如我者,才会在十年苦熬之余再作冯妇。然则晨钟暮鼓黄卷青灯中,毕竟尚有历代的高僧暗中相伴,他们和我声应气求,不甘心被宿命贬低为人类的亚种,遂把译作工作当成了日常功课,要以艰难的咀嚼咬穿文化的篱笆。师法着这些先烈,当初酝酿这套丛书时,我曾在哈佛费正清中心放胆讲道:“在作者、编者和读者间初步形成的这种‘良性循环’景象,作为整个社会多元分化进程的缩影,偏巧正跟我们的国运连在一起,如果我们至少眼下尚无理由否认,今后中国历史的主要变因之一,仍然在于大陆知识阶层的一念之中,那么我们就总还有权想像,在孔老夫子的故乡,中华民族其实就靠这么写着读着,而默默修持着自己的心念,而默默挑战着自身的极限!”惟愿认同此道者日众,则华夏一族虽历经劫难,终不致因我辈而沦为文化小国。

一九九九年六月于京郊溪翁庄

中文版前言

拙著《德国的历史观：从赫尔德到当代历史思想的民族传统》将会有中文版问世，我甚感荣幸。在过去的二十五年中，我与中国学者有很多往来，并在此期间以浓厚的兴趣了解了中国历史思想的进程。通过与中国同行们的持续稳定的交流，我部分地弥补了自己不能阅读中文的欠缺。我很高兴，这部代表了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的著作，在中国引起了人们足够的兴趣。

有必要花点文字来介绍一下差不多四十年前就已出版的这本书。毕竟，自此书 1968 年印行以来，很多事情都发生了变化。它描述了此书出版时在德国依然富有生机和活力的一种历史思想的传统。它还反映了我身为一个犹太孩童时的经历：我体验了纳粹政权的歧视，并在 1938 年秋天逃离德国，侥幸躲过了大屠杀。在成长为一名历史学家之后，我越来越意识到，德国这一历史思想和历史研究的民族传统对于反民主思想难辞其咎。这并不是说它就直接导向了纳粹主义，而是说，它在很重要的方面为 1933 年彻底抛弃民主制和确立权威主义恐怖统治扫清了道路。既见证了 this 政权的种族主义，我个人就有理由去了解很大一部分的德国历史思想所体现的这种非自由主义 (illiberalism)。

现代历史研究首先是在德国被职业化的。19 世纪德国大

学中所实行的学术研究方法,在历史研究成为了一门专业性学科的任何地方,在全世界也在中国得到了极大的尊重。它成为了对过去进行科学而客观的研究的一个范例。当我着手研究很大程度上主宰了德国思想气候的历史研究的传统时,我开始认识到,在何种程度上德国的历史研究绝非德国历史学家们所声称的那样科学和客观,而是高度地意识形态化了的。对史料的批判性分析的强调(这是对历史研究最根本的贡献),与一种远非客观的、而是试图将一种特定的政治和社会现状合法化的历史哲学结合在了一起。

历史学作为一种声称在其方法和观点上都“科学”的专业学科的出现,必须结合其政治语境来加以了解。19世纪时德国(其他国家也一样)对于历史的浓厚兴趣,是与正在上升的民族主义联系在一起的。然而,在德国,此种民族主义却出之以一种特殊的德国形式。它是民族统一进程中的一个推动力量。本书追溯了德国自由主义的悲剧性历史对于历史研究的影响。这个历史运动(指德国民族主义的发展变化——译者)在其早期阶段所宣扬的是自由主义的、在一定程度上甚而是民主的和世界主义的层面,而在19世纪的进程中,它却越来越被赋予了权威主义和侵略性的沙文主义形式。在民主选举出来的法兰克福议会未能于1848年统一德国之后,德国中产阶级的主体部分就转而指望普鲁士王朝以武力手段,用俾斯麦的话来说就是以“铁和血”来完成统一的使命。在形形色色的西欧和北欧国家以及美国,经济上的现代化伴随着的是议会民主制的发展,而在德国,尽管工业化取得了长足进展,民主化却被延宕下来,因为教养良好而拥有财产的中产阶级的主体部分转向了霍亨索伦王朝,后者给他们提供了他们在经济领域内所企盼的很多东西。霍亨索伦王朝还呼应了中产阶级对于成为世界强国的渴望,同时颁布

了一部宪法,保留了土地贵族、军人和君主的诸多特权,还试图将方兴未艾的产业工人阶级摒除在政治过程之外。

本书更加关注的是使德国民族主义的反民主特征得以合法化的历史观,而不是德国在政治层面上未能完成民主化。这种观念被称之为“历史主义”(Historismus)。其要旨在于拒斥启蒙运动的理性和人道主义观念。德国民族的认同是以截然有别于西方民主制的历史观来加以界定的。此种对于德国民族性的认同,不仅鼓动家们在大加利用,而且很大一部分历史学家和其他知识分子也如法炮制,来为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所作所为进行辩护。在德国的 Kultur[文化]与盎格鲁—撒克逊的 Zivilisation[文明]之间展开的文化战争——那是德国精英们借以确立他们对于德国民众的统治权的一套意识形态——中,德国“1914年观念”与法国“1789年观念”迥然有异。作为西方民主观念之基础的启蒙运动被认为肤浅不堪,它假定了一种抽象的人性和一种以普遍人权为预设的非历史的伦理。历史主义或者德国的历史观所坚持的是一种它所认为的历史实在论,也即认定人没有本性,而只有历史。历史学家要致力于严格的公正无偏,用兰克的话来说就是,不要做出判断,而只要表明实际发生的事情。尽管要求历史学家不偏不倚、不要歪曲他的(我们这里可以说“他的”,因为妇女在很大程度上被排除在史学行当之外)发现有其合理性,这却不仅是德国传统所独有的,而是任何地方诚实不欺的历史学家们所共同认可的老生常谈。可是,此种对于在这一传统中为历史学家们所实践的道德中立的吁求,却包含着一种深刻的矛盾。它认定现存的权威体制代表着道德力量。构成渗透社会方方面面的伦理秩序的核心制度,乃奠基于权力之上的国家。权力因而就反映了道德,而国家就像他们所声称的那样,在扩展其权力以凌驾于其他各种号称来自于上

帝的权力之上时,它的所作所为都是正当的。尽管兰克宣扬说,一切时代都平等地直接通向上帝,然而,在实践中,这一传统中的德国历史学家(包括兰克)却区分了更多历史性和更少历史性的时代,否认非西方国家具有任何实质意义上的历史——从而就将西方殖民扩张的开化使命合法化了——而且还断言(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德国文化作为高于其他各种西方文化的历史巅峰而在历史上具有优越性。此种观念并没有像有人可能会预期的那样,导致将历史的视角扩展到人类生活的广阔领域,而是狭隘地关注政治、外交和军事实践,并且不仅导致对于社会史、经济史和文化史的漠视,而且导致学术体制拒斥打破这些藩篱的尝试,并将这些努力视作是要颠覆德国的价值观,还常常将社会史就径直等同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史虽然实际上也有人在研究,却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是将国家置于中心。

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之后,此种观点依然得以延续,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对于魏玛共和的拒斥。即便是弗里德里希·梅尼克这样的纳粹反对者,也在他讨论“历史主义的形成”的著作(1936)中,依旧将对启蒙运动有关自然权利的信仰的拒斥,视作德国历史思想自宗教改革以来对世界做出的最重大贡献。在纳粹时期,许多更加年轻的历史学家(他们在1945年之后成为德国历史学界的翘楚),如维纳·孔茨和西奥多·谢德德尔,将民族认同的观念从以国家为取向转变为以种族为取向,为在东方对非日耳曼人(包括犹太人)的种族清洗进行了论证。1945年之后,他们当然抛弃了对种族概念的使用,并且(尤其是在面临冷战时)不得不修正了他们对西方的抵制,而与此同时又保留了他们很多的传统观点。

本书结束于随着1960年代新一代的到来而发生最初转向之时。我惊喜地得知,一家德国平装书出版商很快发行了一个

德文译本,这个德文本很快就出了三版,数量大得多的公众得以看到此书。尽管美国的第二版直至 2000 年之后还一直在印行,但人们基本上是将它视作一部学术著作,而在德国它却显然发生了某种政治影响。此书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出现在德国话语中的一个关键时刻,是对从 18 世纪晚期开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主导性德国历史思想传统的惟一批评性研究。在 1997 年德国的一个新版本中,我试图跟踪直到 1990 年代中期的德国史学发展。

现在,我来简单地谈一下德国史学思想和史学实践在过去四十年来的主要进展。我所描述的自 19 世纪上半叶以来不仅主宰了历史学界而且主宰广大德国公众的那种德国历史观的支配地位,终于结束了。对于那些在纳粹垮台之后成长起来的西德(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新一代历史学家来说,关键的问题是,纳粹主义的兴起及其种族屠杀的恐怖统治何以可能。与那些依旧占据着历史学教席的老一代人不同,他们并不将纳粹主义视作仅仅是德国历史的一个错乱,是一种欧洲的而非德国所特有的大众社会的现象。与东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那些将纳粹主义视作一种国际性现象、视作垄断资本主义产物的历史学家不同,他们要到德国历史,尤其是民主化所遭遇的失败中去寻找纳粹主义的根源,并且要考察历史主义在这一过程中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所发挥的作用。他们拾起了所谓的 Sonderwegsthese[特殊道路论]——此种观点认为,德国走了一条不同于西方工业国家的道路——却将这一观点颠倒过来,由灾难性的结果出发,以否定的而非肯定的方式来看待德国的特殊道路。这些年轻的历史学家中有许多人如今已经摒弃了德国的历史观。置身于历史主义传统中的历史学家们强调每一历史格局的特殊性,而新的历

史学家们却在社会结构和过程中寻找因果解释。比之德国之外的社会史家(比如说法国年鉴学派的很多人),他们更加注重 19 世纪和(并且特别是)20 世纪,总是意识到社会的政治语境。虽然他们辩解说他们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却接受了在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学中得到重新阐释的关于社会不平等和社会矛盾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观点。他们的目标是要创立他们所谓的“历史性社会科学”(Historical Social Science)(汉斯-乌尔里希·维勒)。然而,不同于韦伯,他们相信历史学家不可能做一个中立的观察者,而是必须表明某种道德立场,而又要小心谨慎地不让这一立场歪曲他们对于过去的建构。于是,他们强调他们对于民主价值和启蒙运动的人权理想的忠诚。然而,他们绝非没有受到挑战。在所谓的 1980 年代的历史学家争论(Historikerstreit)中,保守的历史学家们重申这一论调:纳粹主义和种族屠杀并非德国所独有,而是与斯大林主义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一样,同属现代大众社会的一种现象。然而,在那个时候坦诚面对纳粹主义的暴行及其在德国的过去的根源的思想氛围中,这种辩解的取向在很大程度上只不过是少数人的立场。

在 1980 年代,另一种挑战来自甚至更年轻的一代,他们批评历史性的社会科学在执著于社会结构和进程时,忽视了具体的人的生命。他们倡言一种“日常生活史”(Alltagsgeschichte),转向被历史性社会科学所漠视的普通人在其中占据中心位置的格局和背景,妇女也第一次进入了中心地带。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宏观史被一种人类学取向的微观史所取代,在其中,文化变得甚至比经济过程或社会结构都更加重要。到 1990 年代,社会史日渐认识到文化和文化史的功能以及更加巨大的社会力量的作用。然而,大多数德国历史学家仍然集中精力于德国史。东德的很多历史研究也是同样的情形,在那里,往往按照马克思主义

的基础—上层建筑的路数进行的研究,无法充分说明纳粹政权的恐怖主义和种族屠杀的特征。然而,到1980年代,东德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文化人类学家也开始紧密合作,与西方的日常生活史相类似,但更加关注此种日常生活史的社会和政治背景。

冷战的结束对德国史学(如同总体而言对全世界的史学一样)造成了新的前所未有的挑战。人类学取向的微观史史学家们逃避到一个浪漫的世界之中,这并没有能够回避时代的紧迫问题;德国社会科学史的实践者们全神贯注于德国的过去,也不足以应对一个这样的世界:现代化、全球化以及它们所引发的社会和文化冲突在其中创造出了从前未能得到充分认识的种种新的现实。在这个时刻,在2005年的开端,我们发现自己处于这样一个地位:旧有的历史思想的模式在很多方面已经陈旧过时,这不仅是说德国的历史观,而且还有历史性社会科学和日常生活史的诸多方面。

说到我本人作为一个历史学家自本书初次面世以来的思想发展,我在基本观点上一直是世界主义的,深深服膺于启蒙运动人权和理性的价值观。正是此种信念促使我对“德国的历史观”进行批判性的审视。在我后来的著述中,我试图将德国史学放在西方历史思想和历史写作潮流的更加广阔的背景之中。最近,在不同的论文和一部书中,我与所谓的“后现代”史学观点针对启蒙运动的非理性主义和不可知论发生了争论,那种观点对于就过去进行真实无妄的研究的可能性本身提出了质疑。我一直认为,每一种历史写作都反映了作者的道德和政治观点,然而这并不就等于排除了诚实的学术研究。对于历史的解释可能各不相同,并且历史学家有权采取他们自己的视角,然而他们却没有权利捏造或歪曲事实。好的历史学并不是纯粹的文学幻想

曲。在 1990 年代我开始撰写一部西方现代史学史。我很快认识到,在一个日渐全球化的世界中,这样的研究路数过于狭隘。我现在和一位同事王晴佳(Q. Edward Wang)有非常密切的合作,他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主要训练是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完成的,他在那里取得了硕士学位,又在美国的锡拉丘兹大学(Syracuse University)获得了博士学位。我们正致力于撰写一部起自 18 世纪晚期以来的比较的、跨文化的史学史。其中的一个主题将会是不同文化(西方的和非西方的)走向现代化的各种趋向,这里的现代化不是单数的作为西化的现代化,而是复数的现代化。我们不会将自己局限于西方对非西方社会历史思想的影响,而是还会留意到现代化的各种形态和西方思想与非西方思想的互动。我期盼着在 21 世纪之初跨越民族和文化边界的国际性思想交流的繁荣兴旺。

格奥尔格·G. 伊格尔斯

美国,纽约州,布法罗

2005 年 1 月 1 日

修订版序

自本书首次出版以来,在联邦德国的史学研究中出现了大量的重新思考。虽然与旧的传统和观点的连续性依然存在,但是众多历史学家已开始批判地考察自己的民族历史。与这一批判视角相应的是研究方法上的重新定位,即从传统德国历史研究中以人物为导向的片面研究方法转变为对政治史发生于其中的社会背景的关注。我深切感到新版的《德国历史观》应该体现20世纪60年代以来历史思想中的这一转变。

新版中加入的那一章绝非出于使全书完整的目的,而是试图对构成新历史研究之特点的形式、观点和方法上的转变加以理解。将这一新学术成就化约为某一简单的共同特点是困难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历史学家的研究中存在的差异远甚于其前辈们。不过,在最近二十年的历史著作中,有相当一部分努力尝试理解德国充满悲剧色彩的过去。新增最后一章的大量篇幅就是有关这一努力的。这一强调解释了该章的某些遗漏(就像全书一样),如疏漏了有关中世纪和近代早期历史的大量著作。它也解释了为何注意力集中于那些摒弃传统和描述方法而以新的批判视角研究政治的社会史学家,他们在近些年里变得日渐重要。

还有其他一些疏漏。最后一章集中关注联邦德国的历史研究。这是由本书的主题,即我所说的“德国历史观”的发展和衰

落所决定的。然而有关现代德国还存在国际性的研究著作。20世纪30年代的流亡历史学家们属于最早批判性地分析德国当代史的学者。这一考察在美国、英国、以色列、民主德国和其他地方为更年轻一代的经济、社会和思想史家所承继。我们需要这样一种超越政治界线而专注于问题和方法的德国史学史的研究。

在十五年之后,我自然对本书有了一些重新考虑。本书从未打算对德国历史研究做全面考察。初版序言已明确表示它所研究的是一种独特的政治—思想传统的历史,该传统自19世纪中期直至20世纪60年代始终主宰着大学中的历史著述。汉斯·希莱尔和伯恩德·弗伦巴赫最近发表的两项有关魏玛共和时期历史研究的分析,再次指出这一思想意识在德国历史学界的主导地位。但是任何时候对于历史学界中反自由主义及其片面强调政治的倾向都存在不同观点。我已非常注意德国的自由、民主传统。但是信仰民主的历史学家绝大多数身处职业圈外。不过我如果重写此书,那么我将给予他们更多篇幅。与此相似的是,批判性的社会史研究方法或是来自那些学科外的学者,如路德维希·冯·斯坦因、古斯塔夫·西摩勒、马克斯·韦伯或是完全处于大学之外的学者,如卡尔·马克思。此外读者还应意识到其他传统和方法的存在。我还从弗里茨·林格对德国学术界的分析——《德国文人雅士的衰微》,1969年出版,即本书出版的次年——中获益匪浅。当然,本书并不是将历史观念置于真空中加以考察的。我非常注意历史著作的政治背景。不过今天我将对历史研究和著作产生于其中的社会结构给予更多关注。

在过去十五年中,我有幸与众多历史学家就联邦德国的史学研究的变化状况进行讨论,对于他们,我要表示诚挚的谢意。我尤其要感谢曾阅读新章节的手稿并提出意见的以下人士:威

廉·S. 艾伦、肯尼思·巴尔金、福尔克·贝格哈恩、康拉德·伽劳希、拉里·E. 琼斯、迈克尔·卡特、尤尔根·科卡、阿尔夫·吕特克、汉斯·梅迪克、汉斯·蒙森、汉斯—尤尔根·普尔、恩斯特·绪林、鲁道夫·菲尔豪斯和汉斯—乌尔利希·维勒。我还要感谢鲁道夫·菲尔豪斯在我多次逗留德国期间，允许我将哥廷根的马克斯—普朗克历史研究所作为自己研究德国史学的基地。

1982年8月，于布法罗

初版序

尽管德国史学思想和研究对于整个世界的文化科学的发展有着重大影响——就像它对德国政治与社会思想的巨大影响一样,但是在过去五十年里英语学界还没有任何关于德国历史编纂或是德国史学思想的全面研究。在德国,虽然关于各个历史学家已出版了大量著作,但是近年来只有两部综合性著作问世,它们每一部的写作视角都和本书作者的视角不同。其中一部名为《从德国人文主义到当前的精神与历史》,由一位鼓吹大德意志的奥地利人亨利希·里特·冯·斯瑞比克撰写,他仍然深受德国唯心主义传统影响;另一部为《德国历史科学研究》,是约希姆·斯特莱桑主编的东德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论文集。

与上述两项研究相似,本书起初并未想成为一部有关德国历史编纂的历史。而是试图对从威廉·冯·洪堡和列奥波德·冯·兰克至弗里德里希·梅尼克和吉哈德·里特尔的德国历史编纂的主要民族传统中德国历史学家们的理论假设和政治价值观提出一项解释性的和批判的分析。兰克的保持绝对学术中立的理想业已被证明对于这一传统的任何史家来说都是无法实现的,而且很多人并不喜欢它。然而,这些历史学家的研究依然是与在面临变化的思想和社会环境时保持相对不变的某种世界观和一套政治价值观有密切关联的。本书从它自身内部的矛盾和政治事件的影响来探寻这一传统的解体。在这个德国历史学家们正